

批评“三境界”之感

段崇轩

文学+批评=文学批评。两个简单的词语相加，却生成了一种极复杂、极暧昧、极专业的文学行当和职业。我从事文学批评数十年，但对文学批评这一概念，依然感到陌生、模糊、幽深，难以一下子说清。

中外古今众多的文学家、理论家，赋予文学批评的内涵有数十种之多。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，广义的内涵与文艺学基本相同，狭义的内涵指的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与现象的批评。我以为在数十种说法中，有两种是格外精辟的。一种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王先儒的论说：“文学批评，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、文学理论为指导，以文学欣赏为基础，以批评家所面对的当代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（包括文学创作、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现象，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）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活动；它的目的和任务是：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、评价，指出其思想上、艺术上的得失和所以得失的原因。”另一种是英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欧文·霍兰的论说：“文学批评包括所有声称对一般而言的文学或特定文学作品的价值（或其他方面）进行评判的作品。进行此类评判一般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（或细读）、比较和透彻的分析。”这两段论述可谓异曲同工，蕴含着两个要点，一是批评家要有自己的主体性，即遵循批评者的感情、思想、意志去评论作家和作品。还有一点是批评文章要有学术性，体现出一种客观、理性、公正的批评品格。

理论概括易，写作实践难。用文学批评的特征、标准、衡量当下的文学批评，会发现许多文章是不合格“产品”，甚至是一种非学术作品。这也正是当下文学批评备受质疑、责难的重要原因。而当下文学批评最突出的问题是，把“批评”置换成了“褒扬”，不再对批评对象的“得失”去作深入解剖，不再对文学文本进行“透彻的分析”，不管什么样的作家作品，一概给予肯定、拔高、赞颂，捧为优秀、力作、精品。这其实歪曲了作家作品，损害了批评与批评工作者。

文学界一直想把批评与批评工作者进行分类。譬如法国著名批评家蒂博代，就把批评比喻为“批评的共和国”，其中居住着三种批评家，即“自发的批评”——那种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而又“述而不作”的高层次读者；“职业的

批评”——指那种以批评为职业、建构学科和理论的教授、研究员；“大师的批评”——即那些已获得公认并兼搞文学批评的大作家。这一分类显得简单了些，但很有启发性。它揭示了身居不同位置、层面的读者和批评者，所写出的文学批评会有不同的特征和价值。一位批评者的身份可能是固定不变的，也可能是流动变化的。我从事文学批评近半个世纪，其间经历了历史变迁，我个人则从一位大学教师变为文学编辑，又成为专业作家。唯一不变的是我始终保持着文学研究与写作，孜孜矻矻、不倦探索，但直到“天命”之年，才似乎明白了文学批评是干什么的、它的内涵与本质何在。而在我不同的人生时段，我的批评写作又迥然不同，走过了从“自发批评”到“社会批评”，再到“学术批评”的艰难历程。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，50年批评写作，前30年竟走得大抵是弯路，直到后20年才算摸索到正途。真是让人感慨！

我曾经经历过一个时间不长的“自我”感受与写作时期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开始文学创作，1972年发表第一篇小说，1978年发表第一篇评论。到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从高等院校，先调到地区文联、后调到省作家协会，先后在两个文学刊物任编辑。同时从小说创作转向文学批评写作。时值新时期文学滥觞之时，改革开放、解放思想，倡导文学主体性。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学背景下，我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文学批评写作，一边吸纳现代思想与文学，一边融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，在全国报刊发表了一批文学批评文章。有山西及全国的作家作品研究、有乡村小说创作探索、有批评的批评等，我觉得颇有“自发的批评”的特点。那时我是一名普通文学编辑，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，我的写作代表了自己的感情、思想和立场。但这样的写作只有七八年时间。

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批评文章中的“我”却悄然转换成了“我们”乃至某种群体。1992年，我开始主持《山西文学》工作，随后担任主编，一直到2000年。我一边编辑刊物，一边继续批评写作，编辑、批评两不误。但我渐渐意识到，从编辑到主编，职务变了，思想观念也变了。我写“编稿手记”“卷首语”等，其中的“我”，背后往往是“我

们”，这个“我们”身后又俨然是山西文学乃至主流文化。“我”不再随意发挥、任意发言。这种位置、身份的转化，也给自己的批评写作带来了诸多影响。我研究赵树理以及山西作家作品，研究全国文学的发展与未来，虽然视野、思想有所开阔，但在观念与方法上，却有了更多的社会学特征，少了某种学术性品质。这一段写作历程约有七八年之久乃至更长。

2000年之后，在我“知天命”之年，我离开工作了18年的文学编辑岗位，转调山西文学院从事专业写作。我在批评写作上坚守了二三十年，亟须坐下来潜心治学，需要充裕的时间、自由的空间。我开始“严厉”地检讨、反思自己，是不是走在一条纯粹的学术道路上？自己还存在哪些不足、缺陷和问题？当代文学理论家钱中文先生说：“对于一个知识分子——学者来说，他应追求真理，坚持真理，有着独立的精神、自由的思想；他还应是一个具有血性和良心、怜悯和同情的人，一个富有入文精神的人。”在真正的学者看来，文学批评是一种学术事业，追求真理是批评家的天职，而学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。面对那些前辈学者，我的匮乏、差距太多了。成为专业作家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不受种种社会思想与思潮的干扰，可以摆脱各种人际关系的束缚，就有望成为“职业的批评家”。作为学者的“我”，应该是一个在个体中包含群体，在学术中通达社会人生的人。这样的境界难以达到，但我“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”。

一晃20余年过去了，我读书、研究、写作，发表了200多篇文章，近300万字，主要的成果有60余万字的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》、30多万字的《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》等。还有许多拟想的文学课题有待破土、发掘、动工……

激扬评论 繁荣创作



遣怀吟叹古城新生

——《唐风集》里的咏太原诗(中)

刘小云

由降大任、张成德选编的《唐风集》（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）中，有一些写太原景色的作品。作者都是山西籍和在山西工作生活的老同志，他们的作品都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集中反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太原面貌，我从中选择了写西山的诗作，并作粗浅阐释。

作为本土人，对太原的感情是融在骨子里的。太原是古城，沿河南北穿城，三面环山。古太原有八景，其中一半在西山。西山有几十公里之长，著名景点依次排开。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诗句“水上西山如挂屏，郁郁苍苍三十里”，可见西山之雄浑苍莽。

西山宛如太原的脊梁，也是太原市的天然屏障。西山大美，峰峦叠翠，旧有的和新开发的景点让人流连忘返。其实，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西山就初显植被之优势，从下面几首咏西山的诗里，可看到当年的生态建设之规模，那个时候，已经有了“诗与远方”。

诗人宋剑秋先生写有《仲秋登西山望太原》：

杖策西山去，攀萝上翠屏。
 云寒风不散，石瘦草还青。
 望远千峰秀，登高万壑冥。
 层楼绵百里，星拱太原城。

登西山望太原，时代不同，感受也不一样。诗家登山，必有诗情抒发。宋剑秋是太原著名诗家，写这首五律时，

估计已经上了年纪，所以首联要“杖策西山去，攀萝上翠屏”，那个时候，西山已经有“翠屏”之说，而且，他还是一路攀着植物的藤萝而上。动感出来了，上山还真不容易，要借助天然的藤萝。颌联，写了当时的气候和山色，正值仲秋，有些寒气，但还不至于太冷；石缝上的草有点枯，但还有青色。颈联，从山上远望，山外有山，千峰竞秀；高处往下看，沟壑依然幽深。尾联，切了标题，城中楼房林立，绵延百里，如星一般散落于太原城。一个“拱”字，有了动感，太原市正在建设变化中。

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作《太原西山》：

治乱纷纷往事多，读残史册莫如何。
 政苛岳岳人朝哭，赋重长安鬼夜歌。
 已扫阴霾光日月，还差风物丽江河。
 工农自有回天力，建设高潮涌巨波。

姚奠中先生这首七律，有了穿越之感。他借西山而写太原，起笔直接从历史深处开始，读的是残史，见到的是政苛和赋重，人、鬼非哭即歌。颌联转到太原解放后，已扫阴霾见光明，市政建设从零开始。尾联坚信我们的工农自有回天之力，治理西山，建设太原的高潮很快会掀起巨波。这就是太原人对未来美景的企望，作者饱蘸感情。

时任晋东南师专中文系主任的宋谋场先生作《太原西山竹枝词三首》：

结篱编柳有村翁，共话丰收意正浓。
 卷袖掀须作豪语，黄忠虽老学雷锋。

催谷锣鼓闹堂堂，割麦归来梳洗忙。
 女伴相呼邀看戏，前村新演《李双双》。

前人栽树后人荫，古语流传说到今。
 五月开山八月种，十年松柏要成林。

竹枝词，是一种诗体，是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过来的。宋谋场先生的三首竹枝词，皆写太原西山的风土人情，有民歌的味道。估计这三首竹枝词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。

第一首写村翁，三五成群结篁编柳时，聊起了当下的庄稼丰收，甚至边卷袖边放豪言，自嘲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老黄忠，老了也要学雷锋。第二首写村里的女伴互相吆喝着一起去前村看戏，戏名是《李双双》。李双双曾是农村妇女的偶像，活泼、开朗，又能干。第三首从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”的古语说起，这个道理意味着前人种下的树木，是为了后人享受，这是一种长远眼光和责任观。开山种树，十年见林。西山的绿化大约也就起始于那个年代。

三首竹枝词，都以吟咏风土为特色，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，读来轻松有烟火气。

（图为在西山中蜿蜒的旅游公路 王恩霖 摄）

山河表里是吾家

李文亮

刚接到山西省作家协会“作家回家”活动的通知时，初是惊喜，紧接着又惶恐起来。因为看到今年“作家回家”的名单中，多是省内各地耳熟能详的文艺前辈，而自己作为一名入行不算久的基层文学编辑工作者，能参加进来，颇有些“童子何知，躬逢胜饯”的不安。

这不安的心绪，直至来到活动报到处，见到省作协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时，才慢慢缓下来。当《朔风》《五台山》《娘子关》，以及蕴含着“吕梁”“漳河”“太行”“平阳”“河东”等三晋大地乡土风物名字的文学刊物的编辑，还有多位基层作家，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，一齐汇聚到太原这座都市，回家相聚的暖意涌上心头。

首日的参观学习，由于和大家还不熟悉，难免有些局促。到了第二天，相互熟络了，便放松下来。参观南华门的山西文学博物馆，只见院内新绿成荫，忽地想起数年前，自己第一次来到省作协这座老院子时的场景，那是一名文学爱好者朝圣般的兴奋和紧张。如今，那年自己初次踏入的那间办公室，窗外依然绿叶披拂，只是当年招呼

我们的那位师长已然退休，而这间屋乃至这栋楼，都已成为陈列山西文学历史的展馆。这座百年老院，不仅记录着山西文学的发展变迁，也见证着多少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的成长。

来到省城五一路的省作协新址，各位领导和老师已在门口等着我们了。捧起递来的鲜花，签上自己的名字，又想起那一年的南华门东四条，面对拘谨的我们，那位师长笑着说：“不要把这里当作一个机关单位，这就是咱们的家。”

家，我又回来了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和省作协不少办公人员都加过微信，这次回家，那些微信头像所代表的名字鲜活起来，因为我们已成为家人。

在狄仁杰文化公园，我们一同瞻仰这位被称作“斗南一人”的并州先贤。站在狄公像前，我深深鞠了一躬。我想，狄公之所以在千百年后，仍受到后世的敬重，成为山西的骄傲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正直、贤能和清廉，更有很多感人的故事，比如那则“望云思亲”。

《唐书》载：“（狄仁杰）授授并州法曹参军，亲在河

阳。仁杰登太行山，反顾，见白云孤飞。谓左右曰：‘吾亲舍其下。’瞻怅久之。云移，乃得去。”短短这样一则故事，狄仁杰的形象便不再令人觉得刻板，而是生动亲切起来。太行之上，那片飘飞的白云，是狄仁杰的思亲之情，也是这个民族对于“家”的深深依恋。这乡土之恩绵延千载，即使今日，漂泊天涯之人也常常会想起曾经脚下那片厚重的黄土，表里山河之中的乡关故园。

在清徐县的水塔醋业，参观了古法酿造的宝源老醋坊，也参观了自动化流水线的全新工艺。无论是在传承数百年的老作坊，还是在高科技的新厂区，乃至在那青天白云下的一万口大醋缸之间，我的鼻子始终浸润在一种独特的气味之中。当我饮入那一小盅20年的手工酿制陈醋，终于明白这是种什么样的味道——酸，又不止是酸。那味道里蕴藏着家乡黄土的醇厚，藏着家乡泉水的清甜，那是我们山西“老醋儿”沉淀一世、浓得无法化掉的乡情。不是酒，胜似酒。

记者朋友问我，来到这里有何感受。我说，作为一名山西人，站在这里特别亲切，也特别自豪。是的，这两日的行程，我始终为山西的悠久历史而骄傲。何处是家乡？家是生我育我的那雁门紫塞，家是黄土之巅的三晋山河，家是那无限关山的赤县神州，家是这宇宙中的小小蔚蓝色星球。

作家，回家。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我想起自己办公室那些怯怯的敲门声：“请问这里是《平城》编辑部吗，请问李老师在吗？”那些拘谨而真诚的青年写作者，怀揣着对文学的梦想，一如当年的我。我打开办公室的门，进来吧，这里是你们的家，用你的笔，写写咱们的家。



回眸那片心灵故土

董晓可

1934年，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出版。这部经典作品是沈从文精心构筑的边地之书，也是他生命历程中具有“追忆逝水年华”意味的故乡之书。

沈从文的童年是幸福的，他的学校位于水边，那一派清波与翠绿大地给予了他纵情撒欢的广阔空间，也让他领略了天地之美。后来，他在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感召下，以小学学历只身闯荡北平，经历了无尽颠沛与碰撞，直至得到郁达夫、叶圣陶等人的接济与帮扶，渐渐在文坛上获得一定声誉。在他自湘西至北平的足迹下，伴随的是乡间传统文化与都市现代文化的剧烈碰撞，现代都市的隔膜、排斥与疏离，使居无定所的他感到深深的自卑与孤独。

1928年，鉴于时势格局变化与生计压力，沈从文离京赴沪，开启了艰难的上海租界“寄居”生活。这些，让他加深了对于城市文明的反思，并深深眷恋着那片温情的故乡之地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：在以《边城》为代表涵盖了《萧萧》《三三》等作品的边地书写中，人是懵懂、原始却富有生命活力的；而在《八骏图》《绅士的太太》为代表的城市书写中，一个知识分子沦为都市文明负面效应下的异化物，衍生出虚伪、堕落的畸形人格。从这个意义来看，《边城》是作家沈从文远离故乡后的深情“回眸之作”，是他基于创作自觉的城乡“两地书”，更蕴含了他作为一位羁旅行客找寻心灵港湾的不泯童心。

四川过湖南去，靠东有一条官路。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“茶峒”的小山城时，有一小溪，溪边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。这个人只一个老人，一个女孩子，一只黄狗。

这是小说《边城》的开场白，这种类似“绕口令”的句式结构，让我们仿佛回到了“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庙，庙里有个和尚”式的童谣之中。而在整个《边城》的世界中，沈从文也确实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自洽、自为、自由的童话般的边地世界：在这里，有着湘西地区美丽的景物和原始淳朴的风土人情。主人公因出生时遍地黄黍而得名翠翠，她和爷爷过着宁静的摆渡生活。后来，船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翠翠，决定用当地风俗唱山歌来“决斗”，哥哥嘴笨，弟弟愿意唱两支歌，一支算哥哥的，一支算自己的。但哥哥不愿这样，选择驾船离开，不幸意外离世。而船总并未因此心生怨恨，当翠翠爷爷死后，想要接她来照顾。同样地，当年翠翠母亲的暗恋者老军人杨马兵也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……在此，有着善良美好的人性，有着健康自然的情感，有着美得让人心碎的爱情，也有着淡淡忧伤的哀愁，一切都显得那样纯真、自然。可以说，在《边城》故事中，沈从文以边地歌者的姿态，让我们走近了一个童话式的、纯朴的、可以自由舒展情感的心灵憩息故园。这，是时至今日《边城》仍能给予我们的巨大精神滋养。

20世纪前半页的中国历史，犹如一条剧烈动荡的河道。此种境遇下，我们的文学在“启蒙与救亡”两条激流的碰撞与融汇中浩荡地奔腾。1930年代，茅盾的《子夜》、巴金的《家》与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三部重要长篇相继问世，更是将此种浪潮推向顶峰。同一时段出版的《边城》，似乎背道而驰，然而事实上，这并非沈从文对现实的漠然或退却，而是承载了他在动荡世界的一种来自故乡的心灵安放。在现代文学史上，正是源于个人与故乡大地连接的找寻，诞生了以沈从文为典型，辐射了鲁迅《朝花夕拾》、萧红《呼兰河传》以及废名、萧乾、汪曾祺等一大批文人一脉相承、富有诗情与灵性的故乡承载的书写。而正是这种基于故乡的回望，使得我们的文学在一路向前奔涌的河道中，可以捡拾一下原初的童年记忆，进而生出蜿蜒曲折、幽深优美的别样境界。

今天，当我们重读《边城》，这种回眸找寻故乡记忆的书写，依然具有价值和意义。当我们在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的城市，在为生计奔波的日子里漂泊无依而生发出“我往哪里去”“哪里是我家”的迫切现实追问时，是否也该因“走得大快”而不时停下脚步，回望一下来时路，等一等原初的灵魄。从这个意义来看，《边城》不仅是沈从文道德理想意义上的故园，也是能唤醒我们共有情感经验与思想感悟的心灵故土。



《边城》插图

经典漫谈
 (9)